

研究論文

成爲認同參照的「他者」： 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

吳忻怡

吳忻怡 台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why@gate.sinica.edu.tw）。本文得以完成，感謝張茂桂教授的意見與指正。也謝謝蔡友月在資料收集過程的熱心協助，湯志傑、江斐琪、seminar synergy參與者，特別是潘婉明的討論、鼓勵。也謝謝三位匿名評審的質疑與建議，讓這篇文章得以朝更好的方向修訂。至於文章的缺失疏漏，自是我的責任。

收稿日期：2008/4/1，接受刊登：2008/12/12。

中文摘要

針對學界對朱天心作品表現高度研究興趣而形成的「朱天心現象」，本文以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之社會學關係主義為方法，試圖探究此現象的成因與內涵，並嘗試理解其與當代台灣認同議題與族群關係的發展，有何關聯之處。本研究認為：「朱天心現象」的重要社會性意涵在於，作家的主體行動與書寫，被當成具代表性的外省人認同理念型，是一個可與不同行動者參差對照的重要參考點。這個參考點不斷地被「拿來參考」，以定位行動者自身、定位外省族群、定位國族政治。其間複雜又密切鑲嵌的對話過程，展現了認同議題在當代台灣社會的不可迴避性，及認同辯證過程中所產生的強大張力與緊張關係。

關鍵詞：朱天心、朱天心現象、認同、外省人、參照點

**Becoming the "Other" for Identity Referenc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Zhu Tianxin**

Hsin-Yi Wu

Post 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author uses Norbert Elias' sociological relationalism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Zhu Tianxin phenomenon" in academic circles, highlighting the relatedness of the phenomenon and its connection to current debates on identity issues in Taiwan. Many researchers perceive Zhu's works as a special ideal type of waishen ("mainlander") identity, and variously use it as a referenc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define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waishen-ren"), to analyze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to engage in dialogue focused on Taiwanese/Chinese social identity. Zhu's work reinforces the idea that confronting the complexity and tension of identity issues in Taiwan are unavoidable.

Keywords: Zhu Tianxin, the phenomenon of Zhu Tianxin, identity,
waishen-ren

一、前言

自九〇年代初期以降，朱天心出版《我記得》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後，便成為學界高度關注的作家。無論是從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的角度，或是做社會學、認同研究的觀察，都累積了相當分量的研究成果。有的研究者，對朱天心的作品讚譽有加，有的則抱持質疑與批判。而這些研究、批判的出現與增生，儼然成為一種特殊文類的集結，不僅豐富了大眾對朱天心作品的認識，也值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考察瞭解。

這個研究試圖探究學術界對朱天心作品，表現高度關注的現象，並追問：所謂「朱天心現象」¹的成因、內涵與社會意義為何？此一針對特定作者的學術關懷，與當代台灣的認同爭議，有何關聯？而探究「朱天心現象」，對認識當代台灣的認同辯論，又可提供哪些不同視野？

本文首先透過分析「朱天心相關研究」出現之時間與數量，說明舉證「朱天心現象」的成立。接著藉由Norbert Elias所提出之社會學關係主義（sociological relationalism）為研究方法核心，透過歷史事件、過程的鋪陳，及文本論述分析，來呈現作家朱天心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author as a social agent），與其他行動者間進行的關係形構（figuration）。同時在分析過程中，不僅關注行動者所處的特定社會位置，也指出特定場域（field）之運作邏輯對此形構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力。

藉由這些「關係」形構的探索可以說，「朱天心現象」的重要社會性意涵在於：由於台灣族群認同爭議的發展，朱天心在行動與書寫方面所展現的個人與社會特質，吸引了學界對其論述之「潛在意圖」與意

¹ 此用法受邱貴芬（2006）的啟發。

涵，從事一連串觀察與反應。而朱針對這些「觀察、反應」的書寫、對話與行動，又再促成其本人成為一鮮明的、可與其他行動者參差對照的重要參考點。是以，「朱天心現象」是不同行動者以不同方式與程度，共同涉入台灣社會認同爭議之發展與變遷的過程與結果。而這個參考點不斷地被「拿來參考」，以定位研究者自身、定位外省族群、定位認同政治，則同時呈現朱天心用力甚深、著墨許多的認同議題，所可能帶來的強大張力與緊張關係，及在當代台灣社會的不可迴避性。

二、知識社會學的考掘：「朱天心現象」的形成

1994年，筆者開始進行「眷村文學」的相關研究。研究進行初始，朱天心與其作僅是眾多研究對象之一，然因她在1992年恰好出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屬於最新出現的文本，²遂成為探討的重點。當時，該書一出版，便引發討論風潮。除了報紙、藝文雜誌刊登的書評與論述，³朱天心也自陳收到很多讀者迴響，而迴響程度之大、情緒之激動，是她寫作多年少見的情況。⁴然而當時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仍屬學術範疇的少數，除了讀者超乎預期的反應外，針對朱天心文本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寥寥可數，並不令人意外。除了邱貴芬（1993）、趙剛（1994a）、何春蕤（1994）分別從性別、族群、階級等角度做了初步

² 同年出現的「眷村小說」，還有張啓疆獲中央日報文學獎的〈消失的球〉，但當時獲得的討論並不多。此文後收入《消失的□□：張啓疆的眷村小說》（1996），並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同收入《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2004）。

³ 如：何寄澎（1992）、黃錦樹（1992）、路況（1992）、呂正惠（1992）。

⁴ 見邱貴芬（1998）。

探討，以及楊照（1995a, 1995b）兩篇抒情兼議論的文章外，並無從文化研究、身分認同等觀點所做的學術分析。以朱天心及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則付之如闕。

1997年，朱天心出版《古都》。彼時台灣社會認同議題激盪，學界、文化界開始用更嚴肅的態度來閱讀、評論朱天心。單是《古都》一書，就同時收錄學者王德威⁵的序論〈老靈魂的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說〉、小說家駱以軍的序〈記憶之書〉，及學者兼作家黃錦樹所寫的研究論文〈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等三篇，日後不斷被引用、討論、甚或批判的文章。而學院內的研究者，也漸次在各學術期刊、研討會發表、累積他們對朱天心的研究。此時文學院中的研究生，也開始把朱天心及其創作當成嚴肅以對的研究題目，如曾意晶（1998）、蔡淑華（1999）。

到2000年，朱天心出版《漫遊者》。這三年，對朱天心而言最重要的生命事件，莫過於作家父親朱西甯於1998年辭世。因此，這本「源於父親亡故後的不知所措」而寫成的「悼祭之書」，⁶不僅題材、筆調、文字皆異常沈重，在朱天心的創作生涯中也有特殊分量。王德威曾言：「朱天心九〇年代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及《漫遊者》，是我心目中世紀末台灣文學的首選。但《漫遊

⁵ 王德威可說是朱天心作品的重量級評介者。除《古都》序論外，相關評論還包括〈老靈魂裡的新鮮人：評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頹敗的顫動：評朱天心《漫遊者》〉，見《衆生喧嘩之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2001）。此外他還參與《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2004）、《原鄉人：族群的故事》（2004）兩本與「族群書寫」相關的合集編務。王德威對「族群書寫」的關注除學術興趣外，或許也與其家庭背景有一定關聯性。其家族從中國離散來台的經歷，見《姜允中女士訪問記錄》（羅久蓉等 2005）。

⁶ 見黃錦樹為《漫遊者》序。

者》所操演的焦慮與憂鬱，已經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過猶不及。而環繞新書的不少書評，互拾牙慧，儼然要形成小型文化工業了。」⁷（2001: 70）且不論王德威的「小型文化工業」論，與法蘭克福學派各家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形成之文化工業的批評有何關聯，甚或有無錯置之虞，這個評論除突顯朱天心作品在文學圈受到的關注，把它挪用來描繪此期間學界對朱天心作品研究的累積，也同樣受用。

這段時間，超過十位的研究者，以朱天心爲主題從事相關研究。他們有的出身中文研究所（如曾美雲），有的擅於西洋文學批評（如邵毓娟）；有些在台灣作研究（如劉亮雅），有的則棲身海外學圈（如陳綾琪）；當中有資深研究者（如周英雄），也有學術新生代（如郝譽翔）。研究者的多元背景顯示，朱天心與其作，的確吸引不少學院人士，企圖從她的論述和文本中，讀出一些特別的興味來。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2000至2005年，以朱天心作品爲研究主題或重點章節的碩博士論文，共有12本，特別是在2003年就出現七本之多。其所從出的系所，則包括中文、台文和歷史所等。⁸ 這些論文基本上將朱

⁷ 《漫遊者》出版後，《聯合文學》雜誌自2001年一月起，密集刊登六篇相關書評，包括195期張小虹〈女兒的憂鬱：朱天心《漫遊者》中的創傷與斷離空間〉、197期朱偉誠〈無重力狀態的漫遊憶往：讀朱天心《漫遊者》〉、198期范銘如〈《漫遊者》的拾荒癖〉、200期黃宗慧〈她看見了死亡的顏色：貼近《漫遊者》的幽冥之境〉、201期張蕙菁〈螢火蟲洞話語：讀朱天心《漫遊者》〉，及202期胡錦媛〈游牧書寫：讀朱天心《漫遊者》〉。這六位作者除張蕙菁，皆爲學院研究者。這些書評，篇幅皆約二、三頁，並不多做學術耙梳，重點在對本書導覽及抒發個人讀後感。且六篇評論中，有些分析概念不斷重複。如：「悼忌」、「強制重複」、「記憶／遺忘」等。且所引用的書中段落，亦多雷同。如〈遠方的雷聲〉中，關於停電一段；及〈說明〉中，「那荷花，好香」一段。這固顯示這些段落的重要性，但也說明王德威所言之「互拾牙惠」，實有所本。

⁸ 2004年成大歷史所陳培文、孫潔茹分別完成以朱天心及其作品爲研究對象的碩士

天心作品定位為「族群書寫」，不管是探討「國族認同的失落與爭辯」（劉紋豪 2003），還是透過文本比較考察外省第二代分歧的認同路徑（趙慶華 2004），朱天心作為外省眷村第二代「代言人」的身分，在此時間點上，已然在學術場域中，透過研究累積被確認與確立。從1994到2005年，「朱天心研究」則從新興的討論轉為頗熱門的研究主題。

根據本文蒐集到的資料，朱天心相關研究，大致分為期刊論文（31篇）、專書論文（20篇）、研討會論文（7篇）、學位論文（16本），及其他（16篇）等五類。學術場域的「朱天心現象」儼然成型，然對此現象的成因與內涵，則缺乏深入討論。因此，本文接下來的工作，並不是文本的文學批評，也非文化意義的詮釋研究，而是社會層次的分析。希望透過社會關係形構過程的考察，來呈現不同行動者如何藉由行動與論述彼此參差對照，以呈現他們的認同立場與差異。同時也以時間為軸線，透過鋪陳特定行動、言說與相關認同辯論的鉤合，來證陳當代台灣社會認同議題的不可迴避性。

三、方法論的關係主義與場域概念的運用

先說明本文在認識論及方法論上的立場。根據Norbert Elias所提倡之社會學關係主義（sociological relationalism）研究法，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作為社會學分析的主體，除以文本論述為分析資料，還需考察被研究者所佔據的社會位置、在特定領域掌握的資源與行事風格，及考慮場域中其他行動者彼此間的互動或影響。針對「莫札特何以在生時抑鬱而終，卻在身後流芳百世？」的文化社會學提問，Elias（2005）選擇從

論文。此學術成果的重要性應在於，朱天心及其作品在台灣當代認同爭議中的重要性與象徵性，至此受到台灣近代史學界的承認。

剖析行動者間相互依賴的型態（figuration）著手，企圖拆解音樂家作爲一社會存在（social being），如何因各種社會關係、條件之有無，而導致後續歷史性後果。根據Elias研究，莫札特之所以爲莫札特，不只因個人層次的藝術靈光，也不是因其作品有不證自明的特殊性，而是音樂家與作品，因其文化背景與社會關係，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中被認定爲天才。這種以社會關係之交織而確立的社會事實，會因關係的動態發展產生變化。因此，Elias不僅從個人傳記來瞭解莫札特的專業發展歷程，更關注其個人與社會、文明、社會功能分殊化等發展，這些不同社會型態間，隨時間更迭所交織的複雜圖像。因此回到Elias最初的提問，莫札特的悲劇是貫穿於整個社會之不同標準間的衝突（Elias 2005: 14）。這樣的衝突，也因歷史偶連性（contingency）與個人生命史之交織，成就了個人命運。本研究贊同林端對Elias的詮釋理解：「藝術家的社會關聯性與歷史關聯性，是社會學家掌握藝術與藝術家命運的重要指標」（林端 2005: 23）。唯透過共時性之（synchronic）社會關係考察，及掌握貫時性的（diachronic）社會變遷，才能突顯藝術家、作家這些社會角色的社會性意涵。

如果要問：何以「朱天心現象」會出現？何以朱天心會成爲「族群書寫」的代言人？以及爲何「族群書寫」會成爲當代台灣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文類？那麼，Elias所強調關於個人心理與社會變遷兩個層次的考察，便成爲可能的解答線索。這個線索使我們可繞過朱天心作品秀異與否的評斷，轉而關注其個人生命史之發展與社會關係的建立；另外也可將她個人創作歷程，接續上台灣當代族群議題辯論的發展脈絡，從而由更鉅觀的社會過程層次，來回答這些問題。

本研究另一重要的分析參考概念，是Bourdieu的場域（field）說。Bourdieu將場域界定爲「一種位置間客觀關係的網絡或形構。這些位置

的出現，或對位置佔據者、行動者、制度所施以的決定性上，是被它們的出現（present）與權力（或資本）的分配結構所界定。資本的持有者，基於他們所佔位置間的客觀關係，可以接觸到此場域的特定利益。」（Bourdieu 1992: 97）這個概念對此研究分析的重要性，既在於它可以用來探索那些潛藏的、隱諱的、但卻形塑了行動的關係，同時去挖掘利益、鬥爭的隱性模式，而非僅看到社會結構的功能面或團體的整合面；此外它還點出，社會階級或人群分類，透過場域，有一更為複雜的傳遞與複製過程，而非直線式的取得或繼承。這也使我們在分析朱天心個人的生命史或認同爭議時，更容易看到權力的衝突面、資源分配的傾斜面，及行動者間的競爭。

此外，本研究對於認同與文化的看法，接受Hall（1990）所提倡的觀點：認同並非一組固著的特質，也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透明或毫無疑問；是一種未完成的生產，總是在被處理的過程中，也總是在再現（representation）中被構築。「再現」這個實作，通常標示了我們發聲或書寫的位置，亦指涉再現者所佔據的特定時、地，與所經歷的特定歷史、文化。在這個認識上思考認同，則並非同一（oneness），而是差異（difference），更深刻且更有意義地標示了「我們是誰」或「我們將變成誰」。因此認同不僅是存在（being），也是成為（becoming），是我們被安置或自我安置於有關過往的論述時，對不同的安置方式所賦予的名字。立基於以上的認同觀點，本研究對認同形構過程將強調歷史性的考察，同時警覺認同常在歷史、文化與權力的拉扯共構中，才得以觀察到其可能持續經歷的形變。

四、從個人生命史考察社會關係的建立

(一) 世代、世家與文學爭議：從文學場域看朱天心的「光環」出現

自高中開始發表小說起，朱天心即是文壇注目的新星。這既與她出身文學世家、文字底蘊深厚有關，也肇因她在文學競賽上的表現。她是第一屆聯合報文學獎的得獎人，也是首屆時報文學獎的得主。如此年輕便獲得兩大報文學獎加持，自是文學實力的「保證」。

不過這裡要談的，不是個人層次的文學天分與實力，而是朱天心及同時期的文學社群、讀者，如何將文學的視域、品味與標準，共同推向一個特定的高度；而朱天心又在何種基礎上，佔據了相對制高點。我們必須先理解朱天心生文學生命開展過程中，不同行動者所組成之文學社群的演變，才能理解何以她一直列位於被注目的「領先群」，被賦予某種文學光環。

1. 世代：戰後新生代的文本與情感分享

張誦聖論及台灣現代文學場域時表示：戰後嬰兒潮⁹的女作家，有一種顯著的特質—「自足感」。這種「自足感」有其社會教化的背景，

⁹ 張誦聖此處指的是第二次戰後，普遍發生於歐、亞、北美以及澳洲等各國的出生率大幅提升現象，以及廣大的人口群。其精確的出現與結束時間容或有地區性的差異，但一般說來，是指涉1946-1964年這段時間出生率突然增高的現象。在此鬆散的定義下，出生於1958年的朱天心，也被張誦聖廣泛地歸類為所謂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事實上，據人口學者研究，台灣並無如西方定義的嬰兒潮，而是在1947-1967年間，因為死亡率的降低，出現了一段「人口高峯期」，到了1951年以後，台灣的粗出生率就開始下跌。因此，較精確地說，朱天心只能定義為「戰後新生代」。

有時展現為激進的極端保守，有時則是妥協自滿、自我劃限，如朱天心就其主觀感性的政治姿態中發洩這樣的自足感（張誦聖 2000: 363）。張誦聖並未言明「自足感」與「社會教化」兩者如何連結，何謂「自足感」也非本文關心的重點。這裡想指出的是，張誦聖的觀察點出了一個台灣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分析變項：「世代經驗」。因此進一步該追問的是作者及其同代的「世代經驗」，透過哪些社會建制、歷史過程被形構出來。以致於這樣的「世代經驗」，滲透進文學場域的評價標準與排序中。

自國中到大學畢業（1969-1981），朱天心在國民黨威權政體歷經第一波轉型期間，完成她主要的教育經驗。這段時期重要的政治、社會事件，包括自「保釣」以來台灣退出聯合國後連串的外交挫敗、鄉土文學論戰，及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彼時，國府面臨政權正當化的嚴厲挑戰，亟需處理因權力不足所衍生之內部統治的窘境（湯志傑 2006）。鄉土文學論戰，攪動了社會文化意識的覺醒，呈現民間社會與國家統治機器間的對立，並透露社會內部或隱或顯的矛盾。其後的美麗島事件，則將此文化覺醒，轉接到民衆的政治意識覺醒（吳介民 2004: 339）。蕭阿勤（2002: 190）則認為，當時台灣社會公共領域已出現一波新的、非官方的重構嘗試。年輕知識分子則不分省籍，深受七〇年代初政局與社會變化衝擊，經歷啓蒙過程，產生清晰的世代意識（蕭阿勤 2007: 146）。可以說此世代年輕人，雖接受黨國教育體制的嚴密教化，但也經驗了國家機器對文化霸權掌控開始鬆動的過程，並在各種不同論述、言說併陳的矛盾中，摸索著進行對自我、社會整體與國家認同的想像過程。

這段時間有兩本指標性書刊，可標示朱天心與同代讀者所共享的世代養成經驗與心路歷程，也突顯朱自七〇年代以來如何透過作品，成就

其新銳作家的地位：首先是描繪作家本人與彼時台北都會菁英高中生活的《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其二則是以朱家爲基地、胡蘭成爲精神導師，以中國禮樂道統爲中心思想來發行的《三三集刊》。前者發行當時即再版多次，在學子間激起閱讀風潮；後者則吸引許多文學青年熱情投入，包括：蘇偉貞、吳念真、履彊¹⁰等現今仍知名的作者，都曾爲《三三集刊》寫稿。

三三諸人以朱天心號召力爲最，《擊壤歌》是台灣高中版的《未央歌》，影響力幾可與之匹敵（莊宜文 1998: 60）。也正是朱天心在《擊壤歌》中將僵化的黨國政治教育、巨大聯考壓力、保守沈悶的社會氛圍，及新興中產階級生活情調，以「三三式」唯美浪漫，卻又兼具「新生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爲己任的筆調，轉化成頁頁青春紀事，吸引了廣大的讀者群。《三三集刊》27輯曾刊登〈擊壤歌之後的朱天心：讀者函〉，收錄許多讀者來函節錄，就是上述世代，混合了家國意識與個人成長心緒之集體共鳴的最佳證例。¹¹

在文本與讀者迴響的交織互動間，可以看到所謂「世代經驗」的形成過程。它主要導因於戒嚴環境的禁錮、國家規訓的全面、緊密，¹² 及

¹⁰ 履彊即台聯前主席蘇進強的筆名。當時他是現役軍人，也是《三三集刊》的主力作者。

¹¹ 此處可以參照張茂桂、吳忻怡（1997）針對「教育對於統獨傾向的作用」的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的同質化作用的確存在，當控制其他變項後，教育程度對於統獨光譜的單獨作用，呈現直線影響，教育程度越高，在統獨立場上越傾向「以後統一」。但若考慮大學教育程度受訪者之「台灣人意識」，則大學反而加大了「以後獨立」的傾向。同時，「教育程度越高、同質化作用越成功」的現象，出現在大陸省籍、中國人分類意識、新黨傾向的群眾類屬。由此，朱天心的《擊壤歌》，當時成功吸引一批「準知識份子」高中生，也並不溢出上述的解釋。

¹² 據楊照回顧：「七〇年代卻也是校園最平靜，最少對體制產生威脅、與體制發生

聯考的強大壓力，使年輕人的行動可能性，受到限制，並感知到一種全面且難以突破的抑鬱。因此行動的能量部分只得順著教育系統的強勢引導，以文字為出口，轉化為無害，甚或是符應黨國教化的家國情愛書寫，使作者與讀者在文字往來間，相濡以沫。

關於朱天心與她的「三三」讀者，呼應蕭阿勤對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看法：他們的世代認同，鑲嵌於國族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事，在中國國族的歷史敘事中得到澄清，並依附於國族認同而展開。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因在國族歷史的敘事中定位自我、尋求存在意義且積極實踐，而成為特殊的政治、文化發展之承載者（2007: 147-148）。當時的朱天心，與許多在台灣受中、高教育的同代讀者，確因文字交換與情感交流，分享了相近的意義世界與對國家社會的看法，也產生了連結與彼此認同。這種連結，既打造了朱天心的讀者群與文壇人氣，也構成往後各種有關「主角」朱天心的不同敘事開端。

2. 世家：朱天心的文學與社會關係網絡

探看朱天心的創作歷程，可說從一開始，她就身處於某種具特別地位或類型的「文學圈」中。此群體特性，在遇上特定的社會議題或文學討論時，往往發揮了「放大論述」的作用，讓原就是集團活躍分子的朱天心，更容易被評論者「看見」。這也使得朱天心不管有無企圖，更易被視為某個群體的「代言人」。以下從三個類型來分析朱天心與這些「文學圈」的關係：

（1）早期的朱家文友圈

趙慶華（2004: 34）曾提及朱天心因其父在文學場域所佔據的位

衝突的十年。七〇年代一開始，體制便透過警察暴力權，對六〇年代殘餘的一點嬉皮文化象徵進行清除清掃。」（1994a: 128）。

置，¹³ 而承載較多的社會、文化資本，並使她較易佔據文學場域之優勢支配位置。這裡要進一步討論的，則除了佔據明確的權力位置外，朱天心如何在文學場域中，透過人際網路與社會關係的建立，而逐漸成爲所謂「外省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¹⁴

參與早期朱家聚會的作家季季（2005: 129），曾生動描寫文友進出朱家的盛況。這證明朱家在六、七〇年代，確實是文人交誼的重要據點，及相關社會網絡的交會處。而這些作家往來，自易受到注目，並感受其所散發的「文學勢力」。

另一個朱家文學圈的佐證，是1963年朱西甯與其他13位作者，一同被《皇冠》雜誌簽約爲基本作家。除季季外，這些人皆爲所謂「外省作家」。特別是朱西甯與司馬中原、段彩華，原是所謂「鳳山三劍客」，三人也常和洛夫、痲弦往來走動。¹⁵ 其餘諸人也因《皇冠》爲基本作家們定期舉辦的郊遊、聚餐而時有往來。因此朱天心少時的日常生活，確實常有文人、作家參與其中。

正因成長於這樣一個有許多創作者，且主要是外省籍作家，往來其中的家庭，這些以朱家爲匯聚點的交誼、消息交換，及私下評比與網絡關係，都交織進入朱天心的寫作歷程中。這些關係，可能影響了她對文

¹³ 這個位置特別指的是，朱西甯曾經擔任過六次聯合報文學獎決審委員、兩次時報文學獎決審委員。而這樣的位置，正是焦桐（1998: 249）認爲可以用自身意識形態或審美觀來拔擢作家、引領寫作趨勢的重要權力位置。

¹⁴ 回應審查人之一的意見，也正是體認到Bourdieu的「場域論」強調各場域的權力生態雖然同形、但卻不直接相等的現象，本文的分析認爲不應直接把朱天心的「外省作家」身分或發言權力，視爲其父親之權力地位或「家世」的直接繼承。應該從朱本人的人際互動、社會關係網絡建立，來理解其說話位置與其「代表性」的成立。

¹⁵ 見劉慕沙（2007）〈一盞燈火的熄滅—記老友舒暢〉，《文訊》第258期。

學的理解與想像；同時，也影響了他人，特別是一些相熟的前輩作家，對她作品的評價，並在文學場域點撥、提攜。

以朱天心參與聯合報文學獎競賽，¹⁶ 並獲中篇小說獎的《未了》（1982）為例。此書出版後，讀者可從書末（1982: 29）所附評選會議紀實中，看到諸評審對此文的不同評價。其中，姚一葦找不出這篇小說的長處；張系國則稱此文有沈從文寫〈邊城〉的味道。而鍾肇政感覺作者好像對本省、外省的成見相當深，讓他在閱讀時出現了抵抗感，因此沒有選這篇。

文章勝出關鍵，在於與朱家相熟的司馬中原力薦。司馬極力讚美作者的文學才情。更有意思的是，他說：「《歲修》和《未了》的作者寫的都是自己的人生過程，而我們一直像顯微鏡一樣觀察他們十幾年來的生活，文章不需具名就知道是誰寫的，就像如來佛看孫悟空。」（朱天心 1982: 31）這透露在匿名評判中身為評審的司馬中原，對《未了》的作者與家世背景，實是了然於胸。於是特定文壇前輩在評審時特出的讚美，把朱天心推上了文學獎的授獎台。也可以說，朱天心自創作之始，其「外省作家」的身分，不僅是族裔的繼承，還是與家世有關之社會網絡運作所形成的確認。

（2）「三三」：同好與品味的特殊化效益

前面提及朱天心與「三三」，是關注她與同世代讀者的「共感」。這裡要進一步討論「三三」內部的運作方式，及作者間的網絡關係。

¹⁶ 除朱西甯六次擔任此獎評審外，朱天心的許多作品（包括：《未了》、《昨日當我年輕時》、《時移事往》、《古都》、《漫遊者》等）都曾由聯合報系或相關的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或再版。作為台灣報禁開放之前獨大的兩大報系之一，朱天心個人與主流媒體間，自有相當的緊密關係。就這點來看，楊翠（2006: 163）認為朱天心具有充分發言舞台，有其合理性。

朱天心高中時，結識謝材俊、丁亞民等文學同好，這些人，加上朱天文、馬叔禮，及胡蘭成的學生林慧娥，是組成「三三」的核心人物。故集團初始，即以一些既存的、較爲親近的人際關係爲基礎，不單是一文學創作組織，還是以親情、友誼，甚或愛情爲基底的「同好社團」。這些同好，對外同編刊物、辦座談會、讀書會；私下也一起玩樂旅行、相約寫稿、參加文學比賽，儼然經營出一種王德威（1996: 10）所謂「大時代與小兒女相互雜糅」的社團基調。可以說「三三」諸人最初的行事邏輯，形式上奠基於「禮樂中國」的理念，但實質上卻更像救國團式的寓救國於娛樂。主義、信仰雖是必要元素，但年輕人間的交誼、愛戀更是活動精華所在。

而他們也以此青春情感爲基調，吸納各地的年輕寫手或理念上的親近者加入，如從香港慕名而來的鍾曉陽、及諸多「小三三」¹⁷們。這些年輕人以細膩浪漫的文字談日常生活，用綿密濃稠的語彙寫家國之愛，彼此間以相仿的文字筆調同聲一氣，構築「三三」的浪漫國家愛與對人事的共感。

一個常見的現象是，三三諸人出書時常邀「內團體」成員作序，彼此打氣，相互襯托。如朱天心的《擊壤歌》，朱天文的《最想念的季節》，皆是如此。這些序言除品評文章外，更多是對作者的溢美讚賞。而相互寫序這件事可說明，「三三」所以被視爲「文學集團」，¹⁸一個重要原因是成員間，除了在創作上有集體的辨視特質，更彼此拉抬、相互陪襯。他們既透過各種活動自成一緊密文學團體，也以此對其他人畫出了區隔界線。

¹⁷ 三三諸人用以指稱那些當時尙就讀高中而被吸引加入的學生，如當時的楊照。

¹⁸ 見沈芳序（2004）關於「三三文學集團」的討論。

上述分析並不是主張「三三」，定要因理念而結合，不能受過多私人情誼影響，否則就失去論述的正當性。反之，透過對內部關係基調的認識，我們或許較易理解，為什麼朱天心這些核心成員，日後面對「三三」受到的評論，總帶著刻意迴避與不被理解的遺憾。畢竟「三三」經驗，與他們個人生命史是密密織就的。他人對這段歷史的批判，等於是對其再真實不過的生命經驗，做出否定或誤解。¹⁹

(3) 「外省第二代作家」網：「外省掛」與族群書寫

關於朱天心與特定文學圈的關係，最後一個值得切入的角度，是九〇年代以降日漸成形的「族群書寫」。在此書寫脈絡中，朱天心和她的同輩、後輩們，完成了輕重有別、哀樂不同的「外省人之書」。他們在文字的交互指涉、內外支援中，讓這些「外省籍」小說家成為易被指認的一群。

張大春替《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序時，道：「當人們無知地將眷村視同『外省人第二代』、再視『壓迫本省人的政權的同路人』的時候，『眷村文學』便自然而然地被意識形態的追逐者貼成淺俗的政治標籤，遂也淪為另一種『不解、恐懼的冷漠』的對象。」（1992: 14）這位與眷村淵源極深的作家，曾分析眷村子弟結成幫派的歷史因緣，²⁰也喟嘆眷村第二代，在離開眷村進入社會後的種種不合時宜。²¹他的文學

¹⁹ 但「內團體」的三三成員，恐怕也難理解當初的行動與言說所形成的劃界作用，對非核心成員或不認同「三三」者所造成的拒斥效果。楊照（1994b: 43）曾坦言他與「三三」接近卻無法親近，嘗試溝通但無法共感，終又分離的心路歷程。他個人的感受，反映了不同背景與經歷不同認同軌跡的行動者，依據不同行事邏輯來運作的意義世界。而這些差異經歷長時間深度溝通的懸置，成為難以跨越的對話障礙。

²⁰ 見張大春〈眷村子弟犯罪行為的軍政淵源〉，《新新聞週刊》1990年12月31日。

²¹ 見張大春〈眷村子弟江湖老〉，《中時晚報》時代版1990年12月29日。

創作中，「眷村」成爲一個不斷出現的場景。²² 至於影射前總統李登輝的《撒謊的信徒》，對照九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日益尖銳的族群衝突，更成爲「外省人」蔑視嘲弄「本土政權」的「證據」之一。

駱以軍是朱天心自言欣賞的後輩作家，1993年她替新手駱以軍寫序時說：「我個人當然喜歡並期待駱以軍『這一路』的，每見其開疆闢土的勇健之姿，除了有作爲讀者的一種幸福之感外，還有一種同爲同業，嗚呼哀哉，不獨我瘋的相濡以沫。」²³ 當時她並無法預知，日後兩人將漸被歸爲同類，聚攏在「外省第二代作者」的稱謂下。直到1997年駱爲《古都》寫序，自陳面臨「外省裔」、「男性」、「新人類」等多重定位焦慮；再到出版《月球姓氏》，採用「家族史」書寫形式，披露他的外省父系歷史，終被論者正式圈入「族群書寫」的陣容。²⁴

最後尚須提及的「同掛」還有黃錦樹。在爲黃錦樹《土與火》寫的序文中，朱天心披露了這些「外省作家」的私誼。文中她娓娓道出兩人往來的歷史，透露出同行間的相互砥礪，和朋友同盟的惺惺相惜、同聲一氣。另穿插朱、黃兩人交誼的，還包括上面提及的駱以軍、張大春。雖然朱天心以自身經歷保證黃錦樹在文學批評上的獨立性，但她顯然清楚諸多論者，因黃錦樹對自己作品的理解贊同，而對黃充滿「立場」上的懷疑。是以，朱天心才會強調：「錦樹並不因此放棄爲一些被政客們或本土論者（例如我所敬重的前輩葉石濤先生年來不只一次的說，外省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不肯認同台灣真令人感冒云云）指定爲『雙鄉』背景的第二代作家作品仗義執言，招致在學界、媒體都有進步形象的菁

²² 如《我妹妹》（1993），台北：聯合文學。

²³ 見朱天心（2005b）。

²⁴ 見陳建忠〈荒謬的時代戲劇——談駱以軍的《月球姓氏》與族群文學書寫〉。

<http://www.4book.com.tw/Comment/CommentContentIndex.hi?SSN=1025>

英某親口熱心勸誡錦樹：『別再當外省作家的打手了。』」（朱天心 2005a: 10）

嚴格來講，18歲來台並定居的馬來西亞華人黃錦樹，並不是「合格」的「外省作家」。但他對原鄉的關注書寫，及對朱天心、張大春等人的評論詮釋，卻讓他與「外省人」及「族群書寫」有很高的親近性。他對朱天心的解讀，既反照他自身作為社會中少數族群的不安與敏感，也呈現他堅決主張「維護差異」、「自由書寫原鄉」的文學立場。而他的積極發聲，和朱天心作為「外省第二代作家」的代表性地位，無疑產生輻輳效果，擴大了所謂外省族群書寫的發聲強度。也在引人注目之餘，成為異議者選擇批判的紅心箭靶。

3. 如影隨形的寫作爭議：從「不鄉土」到「不本土」

最後一個與朱天心相關的文學場域議題是：從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起，朱天心就常陷入「作家該寫些什麼？該怎麼寫？」的爭論中。這裡使用「不鄉土」與「不本土」，並非以「寫作題材鄉土或本土與否」來全稱式地指涉鄉土文學論戰或八〇年代中期之後本土化運動的論辯重心。而是企圖呈現在台灣文學場域發展的重要時間點上，朱天心皆曾因為寫作題材（眷村、外省人）與方式（對反對運動的批判等）而成為討論焦點，甚至被標示為「鄉土文學」或「本土化」的對立面。²⁵ 而她自

²⁵ 例如趙慶華（2004: 58）分析朱天心的〈綠竹引〉（1977），認為彼時鄉土文學氣氛漸趨濃厚，相對於朱對「眷村鄉土」書寫所暴露她稀薄而偏頗的「台灣經驗」，此文則投射朱童年在外婆客家莊的記憶，且呈現對客家小鎮的疏離與排拒，暗示了作者與鄉土的悖離。楊翠（2006）認為朱透過小說對政治神話進行除魅，並披露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虛妄性，實是誤讀「真相」（更該批判的真相是國民黨黨國教化系統的操作，或作家自身走過的虛妄之路）、錯認「鬼魅」（台灣新興民主化運動）；也暗示她對眷村記憶的尋溯與書寫，呈現對解嚴前後台灣本土歷史記憶

己也曾以「寫作題材不被認可」來詮釋自己之所以不被某些文學場域行動者接受的重要原因。²⁶

蕭阿勤以敘事認同爲理論軸線，研究七〇年代黨外歷史建構時表示：人們訴說的故事與他們對「我是誰？」、「我應該要成爲怎樣的人？」等一連串和自我存在與自我實現相關的問題有關。且敘事與認同間的關係是「過程的」（processual），兩者相互構成也彼此建構（2003: 204）。他也強調，從敘事認同的角度來看，人們以特殊的方式行動，是因爲如果不這麼做，就會違背敘事所賦予的存在感（蕭阿勤 2003: 210）。此說法提示我們，當七〇年代朱天心與三三諸人，不斷透過書寫、座談，來與鄉土派論戰時，他們可能正是爲捍衛自己的存在感而努力。過去這個存在感與官方國族論述一致，並在政治力保護下避開挑戰，居於優勢敘事地位。朱天心在《擊壤歌》中不斷提及的「國父學說」、「中華民族振興」等，確實是「當時的朱天心」之所以爲「當時的朱天心」的重要內涵。若她與盟友不思積極回應鄉土派對其關懷議題、創作題材的質疑挑戰，則很難面對「我是誰？」這類涉及自我存在與自我實現的重要題目。

不過，若直接用鄉土文學論戰中朱天心的言說，來假設她必然排斥其他族群敘事，並以她對眷村的反覆書寫當作冷漠、敵意與不認同的證

的反動。孫潔茹（2004: 66）則表示「三三時期的過往、小說創作裡缺乏『本土』題材」是朱天心不斷被質疑其認同的原因之一。

²⁶ 朱天心（1994b: 389-390）在回憶鄉土文學論戰時認爲：「面對作品中的激越，思索能不能不以勞苦大眾爲題材，而選擇自己周遭，深有所感的人、事、物來寫。亦即能否按照創作者自己的寫作時間表，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同樣的，今天我以眷村爲題材，並不是對本土認同的游移或逃避……」另外在陳培文（2004: 125）論文所附的訪談，也可知朱天心認爲：「鄉土文學搞到後來檢查你的題材與動機，其實已經脫出文學的本質了。」

明，有可能犯下過度推論的謬誤。因此關於朱天心寫作題材的爭議，根據敘事認同觀點，我們不妨視為不同認同立場的兩方，一種相互影響、彼此抗衡，以致張力益增的「過程式的」辯證：初始朱在論戰中對特定文學立場的堅持與實踐，或許不易通過檢驗；然這些理念因他人不斷檢驗的企圖，卻反而逐漸激化產生質變，成為更有意識、更富政治意涵的策略性寫作。

所謂「策略性」寫作意味某些政治、社會層面的立場、主張，成為創作者亟欲傳達的訊息，有明顯的對話、溝通、辯詰的意圖。朱天心自認早期的眷村書寫，談不上「為外省人發聲」，也與「對抗本土論述」無涉。²⁷ 但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後，大環境的氛圍使她常需面對「為何常寫眷村？」的質疑。這種懷疑，及所隱含對她本人國家認同傾向的不信任，使她明白點出：相較過去，寫〈古都〉時縱不是全面性的，也有相當部分屬於一種「策略性」寫作。²⁸

以〈古都〉來說，作者創作的中心主旨，是小說的第一句話：「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²⁹ 目的是回應不同論者對她一直以來不以台灣鄉土為書寫題材，或不夠瞭解台灣常民生活的質疑。在文學層次，朱天心堅持創作者是絕對的主宰；在社會層次，各族群也應享有回憶或珍視特定生活經驗的選擇權。藉由〈古都〉，她企圖掌握自身對台灣經驗的詮釋權，也宣告部分論者對其寫作題材與認同間的連結及批判，³⁰ 對她

²⁷ 見吳忻怡（1996: 136-137）。

²⁸ 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大和解？」專題（2001）。

²⁹ 見《印刻文學生活誌》第三卷第一期，頁41，謝材俊對〈古都〉寫作過程的描述。

³⁰ 關於這種連結與批判，朱曾舉例：時任《新新聞》藝文記者的已故作家邱妙津曾在一次採訪中問她：「妳認為妳的作品屬於台灣嗎？」。而朱本人則將這樣的問題，詮釋為「血統論」的暗示。見朱天心（2005a）。

已是無法緘默以對的壓力，以至是壓迫。此一策略性寫作傾向，在她最新小說〈南都一望〉（2006）中，更顯而易見。如小說中，她不斷穿插所謂「外省人書」的篇章，以看似悔罪的立場，來呈現部分外省人，在這場安置認同的角力中，面對他人不斷檢驗其國家忠誠度，及被視爲叛國嫌疑犯的不堪。

對前述創作，朱本人的詮釋是「提供對話」，希望打破某些人對「外省人」的刻板印象。³¹ 不論對話意圖是否實踐？結果是否令人滿意？單就選擇繼續處理非常貼近現實的族群議題來看，在距前篇小說發表的七年間，她的確累積許多對此議題的所思所感，以致需再度以文學爲載體，重申一個外省第二代，對當下的不解與不滿。是以朱天心雖一貫宣稱「不會讓任何東西凌駕於文學之上」，但在面對政治與文學的分野之詰問時，也只能用「我是有點把我的公民責任放進來了」（朱天心 2006: 38）的說法來迴避在選擇題材與表現手法上，刻意介入社會爭議的企圖。

而關於寫作題材爭議，本文認爲：朱天心早期創作有其「不鄉土」以致於「不本土」的歷史因緣與特性。而此特性，在日後作家與其他行動者發展社會關係時，被保留下來，甚至刻意放大。但我們與其把朱天心的寫作題材當成爭議焦點或批判對象，不如理解作家和特定題材之親近性的形成過程，則「作家應該寫些什麼？」的「政治正確」攻防爭議，或可不必發生。³²

³¹ 同註29。

³² 邱貴芬（2006）針對楊翠對朱天心的批評，認爲不應去談題材選得「對不對」，而該去談作品寫得「好不好」。此處提出的解釋，則企圖提供一個化解「對不對」議題的方向。

(二) 作家直接的政治介入：與國民黨切割和與台獨 / 民進黨的對抗

1989年，朱天心出版標示其文風劇變的《我記得》。³³ 此前，台灣社會經歷了民進黨成立、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解除戒嚴等重大事件。《我記得》出版同年，侯孝賢推出首部突破「二二八」禁忌的電影「悲情城市」、《自由時代》主編鄭南榕為維護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引火自焚、民進黨則在該年底的縣市長選舉獲得空前勝利。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前，台灣人民還目睹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政爭、野百合學運，及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換言之，八〇年代末期的台灣，民衆在政治、社會等行動面向上有了較大空間，也必須面對日趨多元與複雜的社會議題。而關於朱天心之所以引起關注與爭議，另一可能原因，是她在社會、政治場域的積極行動，使她成爲一個容易被看見的目標（easy target）。

民進黨成立後，1986年底正式以政黨名義進行立委、國代的競選活動，當時朱天心便熱衷參加民進黨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³⁴ 也是這些活力與衝撞並具的政治氛圍，讓她首次寫下具強烈現實批判風格的〈我記得〉，傳達對政治領域的個人關照。但以純文學書寫來呈現政治觀察，並非朱天心表達立場的唯一方式。除了跳出小說家身分寫政論雜文外，³⁵ 更直接的政治行動是參與政黨。

常被認爲「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朱天心，首次入黨是1991年與朱

³³ 轉變方向與程度見詹宏志（1989）。

³⁴ 見孫潔茹（2004: 193）。

³⁵ 文章後集爲朱天心（1994a）《小說家的政治週記》。

天文、謝材俊、侯孝賢一同加入朱高正成立的「中華社民黨」。彼時國家認同議題逐漸浮出檯面：五月「獨台案」發生後，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正式被除罪化；民進黨在十月通過「台獨黨綱」；以學院知識分子主導的《島嶼邊緣》也在十月創刊，展開「台灣人反論」的論述建構。而朱天心則在同年九月，在中時副刊以兩天連載首次發表短篇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正是這段時期，朱不但加入社民黨，還成爲決策委員，參與核心決策，最終成爲該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雖則社民黨終在與新黨合併後，成爲歷史的浮沫幻影，但親身參與選舉的過程，對她來說恐怕是一個重要但另類的台灣經驗。

該次選舉，朱天心等人組成「全國助選團」巡迴全台，爲該黨候選人助選。在過程中，她自認聽到不同族裔、背景選民對台灣社會的憂慮，³⁶ 也以長居北部的作家之眼，在南台灣看見了她嚮往的政治參與模式。³⁷ 從朱的筆下見聞來看，她所認識與感受到的台灣，充滿著族群對立、社會成員彼此不信任，及現代化成果分配不均等亂象；也蘊含草根民衆對普遍知識的嚮往，與人民民主的可能性。可以推論，從助選、助講等實作中，她習得了政治行動的知識與步驟，也增加面對不同省籍、性別、階級群衆的一手經驗。

此後朱天心還曾加入「反對兩黨聯合限時修憲」連署等行動，不過讓她再度受到注目的社會實踐，是2004年總統大選前，因不滿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議題、撕裂族群和諧，擔任文化、社運界人士連署發起的「族群平等聯盟」（族盟）發言人。「族盟」成立時發表「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宣言強調：

³⁶ 見朱天心（1994a: 118）。

³⁷ 同註36。

凡中華民國境內之居民享有平等待遇，以及免於恐懼之自由，有權決定一己的記憶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追求幸福的方式，上述基本人權應受法律保障，以確保任何居民不因性別、宗教、身心能力、父母出生地、文化認同或其他原因而受威脅及歧視。³⁸

此行動之所以值得關注，除了她發言人角色的曝光度外，還在於透過參與「族盟」，她將之前作品中表達的「個人記憶的獨特性、不認同的自由」這些主張，轉化為實際行動標的。加入「族盟」，可視為作家對〈古都〉內涵的社會實踐。

在〈古都〉裡，朱天心透過小說人物鉅細靡遺地梳理自己過去在台北、京都兩城的生活經驗。恰如朱本人，小說主角A對兩地都同樣熟悉，但作為主體經驗，A對京都的情感無人質疑，對台北的感受則不斷有人檢查。作家透過小說言明了自身與台北的連結，呈現她自認再自然不過的「在地經驗」，及因經驗而生，「理當」可自由表達的各種情緒與情感，藉以抗議她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情感檢查」。而「族盟」的宣言正宣示了朱所希冀，各族裔皆「不被情感檢查」的平等對待。該組織透過文宣監控、「族群政策白皮書」，企圖在激烈競爭的政治場域，維護各族群共享的平等公民權。但此行動也因幾近割喉的政治競爭，被解讀為特定的政治野心，甚至是對特定政黨的變相助選。³⁹

這場選舉，台灣族群的對立拉到緊繃，各方人馬皆慘遭各種猜忌、

³⁸ 見《中國時報》2004年1月11日報導。

³⁹ 如吳乃仁批評族盟「假中立」。見《聯合報》2004年2月17日A4版。

不信任、貼標籤之論述方式傷害。選後不久，朱天心發表評論，⁴⁰ 標題聳動且政治不正確地名爲〈我不愛台灣〉。一反文學的委婉雅飾，她將對族群、認同的關注思考，以最直接的方式表達。文中強調「愛／不愛台灣」這種個人層次的感受，不能用來類推爲「台灣人=愛台灣」／「外省人=不愛台灣」的分類等式，因爲這種分類除傷害不同族裔背景之社會成員的情感外，只是政客用以爭權的粗暴工具。自認被扣上「不愛台灣」這頂帽子的朱天心，企圖用「我不愛台灣」這樣「挑釁」的字眼，來批判台灣社會因政治競爭而被一再撕裂的族群和諧。這種下猛藥的方式，是否達成批判之效，不易評估。然朱用詞尖銳，激起部分讀者反感，甚至掀起後續論辯，⁴¹ 卻是事實。

其實朱天心參與過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包括聲援蘇建和案⁴²、TNR搶救流浪貓計畫⁴³ 及「搶救中埔山」環境運動⁴⁴ 等。也曾針對政策或社會現象發表過評論，如：反對出版分級制度⁴⁵、反軍購遊行⁴⁶。這些行動雖也經媒體報導，但受注目的程度卻遠不及她與認同相關的發言。這顯示，朱天心的論述、行動所以受到高度關注，除了她敢說敢作，也因爲當代台灣社會，「認同」確實是極易引起焦慮與關注的議

⁴⁰ 見《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4年4月22日。

⁴¹ 以「朱天心」與「我不愛台灣」爲關鍵字鍵入搜尋引擎，可找到許多轉載或批評此文的部落格。如<http://blog.sina.com.tw/3939/article.php?pbgid=3939&entryid=15368> 等。

⁴² 見朱天心〈但願在陽光下見面〉，《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9年7月5日。

⁴³ 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22/n1565208.htm> 報導。

⁴⁴ 見朱天心〈捍衛我們的中埔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7年6月24日。

⁴⁵ 見 <http://anti-censorship.twfriend.net/at1225.html>

⁴⁶ 見<http://www.ettoday.com/2004/09/25/91-1691019.htm>

題。因此，不同立場之論者常透過對「顯著標的」朱天心的批評、認可或對話，來展顯其立場。討論朱天心的政治、社會參與，最重要的目的是說明：朱的確對許多政治、社會議題持有熱情，涉入相關討論時，更常用詞尖銳予人高調之感，以致引發爭議。然她之所以如此聚焦地被評論，不能遺忘的關鍵因素是，其個人生命層次無法懸置、難以噤聲的關懷，恰巧是台灣社會仍難凝聚共識的認同爭議。朱天心的文字言說，就像熱氣騰騰的火車頭，人們順勢搭上了她的認同論述列車，卻在車上激辯欲去的方向。然車上眾聲喧嘩，使這列爭辯之車，難以停車靠站。

五、歷史關聯性的考察： 朱天心與當代台灣重要國族辯論的關係⁴⁷

前面我們從朱天心個人生命史來考察作家的社會關係形構，論證其作品之共時性社會關聯。但這只是瞭解「朱天心現象」的第一條線索。在朱發展寫作生涯同時，台灣社會也經歷貫時性的變遷過程。以下透過幾場重要的社會辯論，來鋪陳朱天心作品與這些辯論的鉤合，藉此呈現作家創作與當代社會歷史發展的貫時性關聯。

⁴⁷ 關於朱天心個人生命史與台灣重要認同議題相互參照的大事紀，詳細時間對照參考附錄1。這個以朱天心生命史、朱家大事紀與重要認同議題事件的交互參照，基本上是希望呈現理解台灣認同爭議相關事件的歷史發展軌跡，而避免以斷面的、孤立的方式來看待本文所分析的幾個重要國族辯論，和涉入辯論的不同論者。不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學界研究所形成之「朱天心現象」背後複雜的社會意涵，因此對1970年代前，一些可能造成之後認同爭議白熱化的成因，如：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文化、語言政策，並未在此列表的基礎上，做深入討論。反而是認同爭議中，朱天心與其他相關行動者的論述與言說，彼此的互相詮釋、理解、誤解，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

在這些辯論中，朱本人不見得是積極的行動者，然辯論中交鋒的言說、不同觀點的對立、社會氛圍的緊繃，卻讓創作家及其創思過程、作品，捲入了後續的社會對話。而不斷被討論，也不斷發言的朱天心，實是透過文學、論述的生產，展現了「作家」的社會能動性（agency）。理論上文學創作固然由作者全權主導，然作家身處的社會氛圍，該社會的組織、分配原理、社會關係建構法則，卻一定程度影響了作家寫作生涯的行進軌跡。朱天心幾本代表創作，雖不能等同這些社會辯論，但在分享同一社會脈絡與結構條件的情況下，仍可視這些創作與辯論爲「非同步對話」。作爲社會性存在（social being），作家與其作品都不可能處於社會真空的狀態。朱天心身爲「創作者」，和她「成爲」一個「外省人」或「外省作家」，是在結構中同步發展成型的。在各種非預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朱天心的寫作專業與她的認同歷程，恰是隨著許多複雜的集體對話同時開展的。

（一）想起？遺忘？眷村的兄弟們：從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之爭到94年台北市長選舉

1989至1992年間，國民黨權力鬥爭族群化的「主流派」、「非主流派」爭議，浮上檯面。李登輝主導的「主流派」企圖推動國民黨本土化，黨內傳統外省人勢力，即「非主流派」，則因權力與意識形態衝突終自國民黨內分裂（張茂桂 2006: 55）。這個「國民黨本土化」的發端，引發後續的權力競逐，其間還發生「反軍人干政」此種針對「李郝體制」的社會抗議。連串對立在1993年3月14日，新國民黨連線立委至高雄舉辦說明會時達到高峰。不滿群眾在會場與連線支持者發生肢體衝突，辱罵「中國豬滾回去」，擦槍走火的衝突情勢，透過媒體傳送，對

當時緊繃的族群關係造成相當震撼。

民進黨也在此時開始發展「四大族群」論述。過去社會中被淡化、禁止談論的族群差異在新的人群分類中，重新被申論確認。新的分類方式，不僅提供在舊社會組織原理下，不論在實質或象徵層次，屬於分配弱勢的族群，一個復振認同與要求資源重分配的論述邏輯；也讓許多被視為「最受國民黨照顧」的外省人，開始意識到過去「本省／外省」分類與黨國連結的特殊歷史過程，及其中隱含的權力傾斜。

在新分類出現的當口，必有許多適應、衝突的過程，也有不同陣營力圖強化或減弱此分類之確立的各種行動。因此這段期間「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成爲敏感話題，許多與此新分類相關的社會行動也應運而生。從整個歷史過程不難看出，這段期間，不同認同陣營的行動者，皆卯足全力來主張自我認同基礎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兩造在忙於說出自己故事的同時，卻很少去傾聽別人說了什麼？爲什麼說？因此當94年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出「身爲台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時，既道出許多在認同與情感上，長期遭受壓抑的本省族群心聲，確也激怒或刺傷不少心中有另一道傷痕的外省人。而後，也出現台北市長選舉時，候選人以「中華民國保衛戰」爲選戰主軸，來爭取選民認同的現象。這顯示當時，對「我是誰？」這個認同的核心問題，許多人已面臨不知如何回答，或發展不同回答的境地。

理清了社會發展脈絡，再回頭來看朱天心的創作，就更能理解，《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爲何比標示文風轉變的《我記得》更受到讀者青睞。原因就在於後者固是朱個人寫作的重大突破，卻只顯露作家本人在政治、社會觀察上，較一般人早現的敏感不安。然而前者卻成功擷取了部分外省族群在面對新政治社會情勢時，集體心理的惶惑與不知所措。此種不安感受，常在不同的社會互動情境中，以極其幽微的方式出現。

然則朱天心的小說，不僅寫下眷村生活史，也說白了那難以言喻的集體心理狀態與發展過程。

事實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書中，只有一篇同名短篇小說，涉及所謂族群議題。但出版商巧妙地選擇以最敏感的〈眷村〉一文爲書名，並以「畸零族群」爲宣傳主軸。除了呼應作家個人的核心關懷，出版者的確也敏銳地感知當時社會族群論述的相互對立、族群議題在彼時所能吸引的目光，與後續可能衍生的討論、曝光度。是以，《想我》一書成爲朱天心備受關注的作品，不單是因爲她書寫了一個心有所感的題材，並得到文學場域的認可。還因爲她在文學場域的創作，與當下社會與政治場域的論辯、各種權力和資本的競逐，密密交織難以切割。Peter Berger與Thomas Luckmann認爲：「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不只是關於『知識』在實證上的分類，它還關心任何『知識』實體被建構爲『真實』（reality）的過程。」（1966: 3）而朱天心的作品，從「小說」到「被分析的文本」，到逐漸和相關論述累積成一組「知識實體」，正是經歷這樣一個與台灣社會族群論述彼此援引，相互回應的歷史過程。

（二）古都？新城！：《中外文學》論戰

94年台北市長選舉掀起的「中華民國保衛戰」落幕後，另一場與族群、認同相關的論戰，是始於1995年二月的《中外文學》論戰。這場學術論辯以陳昭瑛〈論台灣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一文爲起點，次年十月廖咸浩的〈狐狸與白狼：空白與血緣的迷思〉告終，歷時一年八個月，共七位作者、18篇文論涉入其中。其參與人數與時間上的延續，都堪稱是本地人文學者對「本土化」概念的積極介入。邱貴芬認爲：這些尖銳對話反應了當時大環境的動盪不安，呈現台灣後殖民課題

與族群、國家認同相互鑲嵌的複雜關係，也是截至當時，台灣有史以來有關身分認同，在理論層次上最大規模、最深入的辯證（1999: 5）。

在艱深晦澀的學術語言中，這場認同理論辯論實有關於研究者個人之國家認同「統獨辯論」的內裡。例如，陳昭瑛的中國民族主義統派立場極易判讀，但她不遮掩政治判斷的文字，如：「陳芳明為何這麼愛檢查別人用詞是否『為匪宣傳』？實在是因為他在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製造了太多莫須有的對立，自己因而陷入過度緊張的精神狀態」（1995: 85）在學術論文中仍屬少見。又如：「拙文並無意為獨派提供萬用寶典，但是如果能在這個局部合理性的問題上引起進一步的討論與釐清，恐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政治實用性』吧？」（廖朝陽 1995: 107）、「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獨派都敵視外省人，也不是說只有獨派才会有此偏見。」（廖咸浩 1995: 71）等文本，也呈現了研究者在進行學術辯論時，如何難以跳脫當代台灣「省籍、統獨、認同」這些交雜難解，自身立場不易排除的現實泥沼中。這顯示特定歷史片斷，確實與行動者的日常經驗乃至論述生產，密切又取徑複雜地交互連結。學術辯論已然如此，更別說未將「客觀、價值中立」置於優位的文學創作。

《中外文學》論戰前，朱天心已出版《小說家的政治周記》，表達其對94年之前政治場域的總評。96年她開始寫〈古都〉，除上述《中外文學》辯論、李登輝訪美及其爭議、中共飛彈威脅外，台灣社會還見證了民進黨與新黨「大和解」的努力。朱天心後來回顧她寫〈古都〉的過程，⁴⁸談及「策略性」書寫，這些事件都成為她醞釀文本的原料。包括：台北市長選舉，她擔心長輩搭計程車時，會因暴露外省口音而引發衝突；論李登輝訪美、飛彈危機，則覺當時社會氛圍讓她很陌生，好像自己過去認可的都被抹煞。且不論對這些事件的感受詮釋有無爭議，在

⁴⁸ 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第43期「大和解？」專題。

作家的坦白中，〈古都〉文本與當時台灣族群關係發展與轉變的關聯不言而喻。各種社會論述間的競爭與結果，無可避免地影響了作家作爲行動者的感知和態度。

〈古都〉裡，朱天心希望掌握的歷史詮釋權與發言權，事實上正是該時期在各方論述僵持不下的狀況中，不同行動者共同的追求標的。作家感受到自身族群過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國家機器保護的發言與詮釋權，因時事變遷而日益迫促，遂興起復振權力的企圖。部分論者認爲此種「迫促感」，恰好反諷地印證了過去特定族群對該權力獨霸的事實。但這裡更想提出的是，〈古都〉之所以不斷被當成分析文本，正是因爲作家「難道我的記憶都不算數？」的質問，恰恰凸顯了當時社會不同群體對歷史詮釋權的劇烈爭奪。

（三）漫遊者？停駐者？——台社季刊〈大和解？〉專題

前面針對〈古都〉，已略提及台社季刊的「大和解」專題。其實這個專題出現的脈絡，就值得加以仔細耙梳。

以朱天心個人來說，《古都》出版後，她發表〈我不屬於台灣，要屬於哪裡？〉一文，再度表達身爲外省第二代，屢被「情感忠貞檢查」的不滿。1998年三月朱西甯去世，因不認同李登輝作爲與台北市長的施政，朱家將總統頒發的褒揚狀以資源回收方式處理，並婉拒陳水扁參加告別式。此事原屬朱家私領域範疇，然被朱寫進〈《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一文，並於隔年四月刊登於聯合副刊後，遂成一公開文本，產生特定社會後果。對部分讀者來說，朱天心的高調「坦白」毋寧是對李登輝、陳水扁，及兩人所象徵之「台灣意識」的不屑與輕蔑。此文後又收入新書《漫遊者》，更彷彿宣告作家對兩位政治人物及其象徵之複雜

意涵，毫不遮掩的鄙棄。

就社會整體層次而言，這段期間發生具族群意涵的重要事件，一是1998年「台灣人」陳水扁連任失敗，「外省人」馬英九重取台北市執政權；一是2000年「台灣人」陳水扁於總統選舉獲勝，民進黨首次執政。在接連的選舉中，台灣社會的族群議題也因政治領域的白熱化競爭，同樣進入白熱化的辯論過程。

因企圖透過知識上的努力，尋求各族群相互理解的可能，台社季刊等單位以「爲什麼大和解不／可能？——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爲題舉辦座談，邀請與會者發表論文與看法。分析這場座談會的發言，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台灣社會因族群議題而引發的焦慮，不獨呈現於作家文本中，也是學院知識生產的重要動力來源；二、在尋求「大和解」的場合，不同立場者間的杆格，卻多於彼此的共識。

就第一點來看，發表論文的陳光興自陳，論文完成的動力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焦慮。因族群議題引發的不安，成爲他從事批判性文化研究的血肉。他表示：

省籍問題對我個人而言，一直是一個知道存在，但是很難直接面對的問題。作爲台灣新一代的左翼份子，在我們的主觀世界裡，階級與反帝的關切優先於族群問題，但這跟其他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一樣，客觀情勢迫使我們終究要面對社會中真實的主要的情緒矛盾。⁴⁹

所謂客觀情勢即是政治場域不斷激化，以至向其他場域蔓延的族群對立。陳光興在座談時透露，作爲外省第二代，他承受了被貼標籤、不

⁴⁹ 見文化研究月報第四期。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04/forum_4.htm

被信任的痛苦。這種「研究後台」告白，與不少研究生投入朱天心小說研究的原因，實爲異曲同工。⁵⁰

就第二個現象來說，這場探詢大和解可能的座談會，也顯露不同論者在觀點上的明顯歧異。作家宋澤萊就認爲：⁵¹

這場討論會，我想朱天心還是要比我重要，畢竟外省人何去何從才是大家要加倍關心的，本省人反而不重要，因爲本省人只能勇敢地當台灣人沒有第二條路，同時本省人多，不用和外省人對立，一些比較有遠見的人早就不以爲必須分本省人外省人，本省人其實並不如外省人自認的那麼排斥外省人。

但對朱天心來說，外省人與台灣的連結是不該被質疑的，任何對外省人有「別的故鄉」可去，有「別的政權」可效忠的假設，都是相當粗暴的言說。朱、宋兩人的基本歧異，也反應了不同族群在公領域層次，彼此信任度不足的關鍵點。一方懷疑外省人可能的「大中國情結」，將導致其他族群陷入生存險境而缺乏信任，另一方卻因這樣的懷疑而感到屈辱受傷。

理解了座談會的相關發言，再比對早座談會半年出版的《漫遊

⁵⁰ 如孫潔茹表示：「直到筆者剛巧路過1993年3月14日新國民黨連線在高雄中學演講所引發的衝突，感受到『惘惘的威脅』，那是第一次筆者感受到『政治』的力量，並強烈地希望自己是個會講台語的本省人，與身爲外省族群的無助。」（2004：2）不過本文提出陳、孫兩個例子，並不在於主張有某種特定「加害／被害」關係的成立，而在說明這些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感受，成爲他們探究認同議題的重要原因與動力。

⁵¹ 同註49，宋澤萊發言。

者》，就更能理解在〈遠方的雷聲〉中，朱何以用：「假想，必須永遠離開這島國的那一刻，最叫你懷念的，會是什麼？」（朱天心 2000: 132）來破題。因為「離去的可能」是她不斷被質疑的問題。在無法阻止他人發問的情況下，只得選擇自問自答來「破解」這個不必要的懷疑。而自稱是「漫遊者」的朱天心想證明的，是她在這塊土地上，其實一直扮演「停駐者」的角色。

六、以朱天心爲他者的參差對照

前面已從作家個人層次，及台灣社會族群議題的脈絡變遷，來說明朱天心論述受到高度關注的原因與過程。最後將以四個朱天心認同研究爲例，來呈現作家在不同研究中，被當作參照點的不同方式。這些被討論的研究在既有的朱天心認同研究中，佔有一定重要性。⁵² 更關鍵的是，研究者在選擇同一參照點的同時，既透過對朱天心的再現、批評或理解，定位了（positioning）己身，也參差對照出研究者彼此間在認同定位上的異與同。換言之，這些共同成就「朱天心現象」的研究與再現，證陳了Hall（1990: 227）所言：差異的界線是在與不同參照點（points of reference）的對應關係中，持續地被重新定位（repositioned）。朱天心作爲這些研究者共同選擇的參照基礎，既反應了他們對所謂「外省人認同」的關注、詮釋與異議，也提供其他讀者更理解研究者本身認同定位的機會。

同時，兩位「外省人」研究者與兩位「非外省人」研究者對「外

⁵² 例如較晚出現的楊翠（2006）、趙慶華（2004）研究，同時都對趙剛（1994a）、邱貴芬（1998）進行引述。同時，這四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高頻率地出現在眾多研究朱天心的碩、博士論文中。

省人」朱天心的認同研究，出現部分跨越族群界線的相同理解，也同時有著族群界線內的詮釋差異。這個結果也確認了：「認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或「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position），動搖了關於認同的「來源法則」（law of origin）。（Hall 1990: 226）。四位研究者對朱天心認同的理解，說明：以「血統論」、「背景論」來理解、推定台灣複雜的族群或國家認同議題，實是最無益的方式。認同除了是現下的存在（being），也涉及可能的變化（becoming），既是歷史的產物或繼承，也包含了開放的可能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及不同研究者彼此間，可能經歷相同而連續的歷史經驗；也可能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發生經驗的斷裂與差異。若非仔細探究「主體」與「他者」的對話協商，把梳過程中的承認或誤認，我們實難深刻地逼近對特定認同的認識。

（一）相對於朱天心的「其他外省人」研究者

1. 強調階級優先的趙剛

同樣眷村長大的趙剛，⁵³ 其學術觀點與社會參與首重階級議題，並敏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國家」與人民）間的宰制關係。因此解讀朱天心作品時，趙剛首要疑問是：「行動者與政治權力及階級利益間，究竟（應）維持何種關係？」

基於這樣的認識論基礎，趙剛（1994a）批評朱天心的「眷村小說」反映了作家在族群和政治上的認同變化，也顯示部分「外省第二代菁英」，保守、反動，向當權者靠攏的性格。對趙剛而言，寫《未了》的朱天心，是帶著優越感與執政黨站在同一邊，鄙視並污名化他族

⁵³ 其眷村經驗見趙剛（1994b）。

的外省菁英；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卻寫成了「政治宣言」，「覺今是而昨非地呼籲所有的眷村外省第二代女性放棄她們原有的族群與政治認同」。他透過研究批判：小說家以工具論角度來操作認同，而此工具論認同背後隱含朱天心對既得階級利益的執著。當為數日多的外省男性因政治權力結構鬆動與環境變遷，而（自認）面臨階級向下流動的危機時，朱天心卻以「背棄」原族群認同的方式，⁵⁴ 向新當權者輸誠靠攏，以保持原有階級利益。

對比趙剛、侯念祖（1995）另一關於眷村女性認同的研究，可知：作為同時具階級、性別、族群身分的多重行動者，眷村居民並不因同一族群身分，而出現相同的行動目的或和諧的互動關係與相互理解。反之，村民會因階級、性別等因素影響，出現彼此傾軋、壓迫。男性外省第二代「後面的」部分成員，因挫折的階級經驗，在追求對新的強勢族群或準國族的認同過程中，會對外省第二代女性進行污名化論述，使之成為男性認同政治的犧牲品（趙剛、侯念祖 1995）。

從上面針對朱天心的批判，與相關眷村認同研究來分析，不同於前述左翼知識分子陳光興最終還是選擇透過研究去面對認同矛盾，趙剛、侯念祖強調特定認同論述可能成為某種披著情緒外衣的政治工具，合理化既存的或即將改變的社會組織分配原理；也堅持，與其進入眷村認同的實質論述討論，不如去問：「誰在談這樣的族群性？誰在這般的論述中獲利？誰受害？」（1995: 160）。藉強調對階級傾軋的抵抗，來迴避如朱天心一般感情用事的認同探索，乃至是認同操作與操弄。

不過值得反問的是：研究顯示，女性固然常是認同政治中被污名化的他者或受害者（趙剛、侯念祖 1995: 158-159）。但朱天心有關選擇與閩南籍男性通婚，而煎熬於認同拉扯的女性敘事，為何卻被視為作家

⁵⁴ 此方式應指外省女性與閩南族群男性通婚。

「放棄」原有認同，向新當權者靠攏的例證。這也讓人好奇：女作家是否終究逃不出被污名的命運，被認定爲眷村的叛徒？再者，認同作爲一種被體驗的經驗與情感，若僅爲避免感情被虛假操弄的可能性，而緊守「工具論」的角度面對之，是否有助於我們對認同進行更深刻的理解？左派學術傳統提醒研究者，面對國族打造過程要保持相當的敏感度與謹慎，不能讓集體性或同一感的美好表象，遮掩了國族建構過程中性別與階級間的傾軋。但此認識論上的警醒，在分析實作中確有其落實難度。概括在「外省人」或「眷村族群」類屬下的人群，確有相當歧義性，也展現了多元的生存樣態和認同傾向。面對不同的問題意識，如何不過度類型化階級或性別的分析方式，不過度工具化地去解釋認同議題，則還需要研究者邏輯一致的謹慎操作與努力。

2. 展現台灣認同的趙慶華⁵⁵

同樣擁有「中國父親／台灣母親」的女作家朱天心與阿媽，在以父系族群爲身分繼承來源的社會慣習中，皆可歸類爲「外省第二代」。然則不同於朱天心外省第二代的「理念型」形象，阿媽自公開發表創作以來，便是以承繼自母系的「原住民女性」身分出現於文學場域。針對這個差異，趙慶華（2004）透過比較文本的方式，來探索兩人的認同形成過程，以及形成不同認同與自我定位的可能因素。

關於朱天心，趙慶華（2004: 99）認爲：朱極力爭取的「不認同的自由」，是對台灣認同的逆向操作。亦即，朱天心抗拒的是認同的對象「台灣」，而非「認同」本身。而造成朱抗拒台灣認同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無法放棄或反省外省人曾因佔據統治位階，而享有異於台灣其他族

⁵⁵ 趙慶華（2004）在論文的謝辭中自陳：「正因爲我是人們口中所謂的『外省第二代』，所以更應該進入『台灣文學』的世界。」

群的優位權力關係。當原有的優勢隨著國民黨政權潰敗而改變時，朱作品中對「台灣」、「本土」的拒斥與疑慮，正說明了：「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同時，『外省族群』也失去或揚棄了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無論出於素樸的情感與信仰之崩解，還是由於被迫交卸『既得利益』的憑藉，歸根結底，文化的、政治的、土地的『中國』想像共同體建構，始終無法脫離黨國機器的操控。」（趙慶華 2004: 3）也因堅決不肯棄守優勢位置，朱的文本與論述如同戴上「殖民者眼鏡」，常對所謂「不如彼者」流露出傲慢與偏見，以貶抑、矮化其他族群來維護自己的族群認同（趙慶華 2004: 44-48）。

強調身為外省第二代，更應虛心理解台灣社會的趙慶華，在「認同建構論」的理論基礎上，直指朱天心受黨國機器影響而形成的固著國族認同與殖民者心態，以批判朱所追求的「不認同的自由」。她也對朱「醜化對照組（本省人、本土化運動）」的書寫策略不以為然，認為朱透過「醜化他族」建立的主體性，顯露特定意識形態下的「選擇性記憶」，亦是其毫無意義的認同焦慮來源。簡言之，趙慶華認為，朱天心對認同議題的焦慮與煩惱，全因她不肯換一張新的「身分證件」（2004: 99）。而「換一張新的身分證」，則是趙慶華作為外省第二代從事「自我反省」的結論，既挑戰朱天心，也認肯外省人「重新打造（台灣）認同」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在趙慶華的論文中，批判朱天心昧於階級優勢的趙剛，同樣被視為：拒斥「外省人是一種優勢族群」的同路人（趙慶華 2004: 30）。在她的分析中，兩人同因欠缺對歷史的反省，忽略國府在以「打壓本省族群」為基礎的體制上，給予外省族群不公平的「特殊待遇」，才會把其他族群爭取公平的努力，視為一種威脅，並出現排斥、恐懼。趙剛迂迴地迴避了特定國族認同的宣示，轉從階級的角度來批判

朱天心對當權者的依附；趙慶華卻直陳國族認同才是問題根源所在，轉向台灣認同才是解決認同問題的唯一良方，明白披露其台灣認同優先的立場。同可被歸類爲「外省人」的趙慶華與趙剛，既站在迥異的視角上去理解朱天心及其認同，也同時呈現了不同外省人對認同議題的紛雜立場。

（二）相對於外省人朱天心的「其他族群」研究者

1. 從後殖民女性主義反思、召喚與接納的邱貴芬

和朱天心有同窗之誼的邱貴芬，學術關懷部分聚焦於台灣社會進入「後殖民」後，國族建構過程與文學作品中呈現之認同政治的關聯性。她對當代台灣歷史進程的「後殖民」定位，不單說明其知識論立場，也對自身的政治態度做了一定宣稱。

邱貴芬認爲，在評析朱天心這類「與己方立場對立的文學作品」時：「重點不在貶斥其意識形態立場，而在探討其意識形態之歷史根由與內部矛盾。」（1993: 95）她表示：朱天心一方面承繼眷村文化對本土認同的遲疑矛盾，同時也接受父權文化對女性定位的排斥，因此成就了拒絕定位、自我放逐的特殊風格（邱貴芬 1993: 95）。亦即，朱的創作是充滿矛盾的：她既接受充滿威權、父權色彩的黨國教化，對新的、以台灣爲主體的文化政治與論述表露疑拒；卻又不甘受制於傳統性別角色，企圖透過對小說中敘事者性別的操控，假借男性敘事找到更大的發言空間與權威。

邱貴芬自陳，她是站在「女性台灣人」的立場來完成此研究（1993: 95）。可以推論，她自認與朱之間基本而巨大的差異在於：一、朱天心不認同自己的性別；二、朱天心不認同成爲「台灣人」。以第二點

來看，邱貴芬的看法與趙慶華相同，兩人雖在客觀標準上屬不同族群身分，但在主觀層次卻分享了相同的國族認同。有意思的是，趙慶華（2004）對朱天心的「不認同台灣」，嚴厲批判。邱貴芬卻在文末寫道：「朱天心的慨嘆：『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濃縮了多少眷戀爭執矛盾。面對朱天心，我的姊妹，我發現自己亦有極其複雜的心情。啊！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1993: 107-108）雖未言明其心緒複雜的原因，然合理的推測是基於某種特殊的互動經驗或情感連結，邱貴芬試圖對朱天心「姊妹」做出台灣認同的召喚！

且不同於趙慶華視「不認同的自由」為毫無意義，從後續邱貴芬（1998）與朱天心的訪談中可看出，儘管她不一定同意朱天心對文學與政治的看法，但兩人對所謂「不認同的自由」在各場域應被當成可欲的選項，卻似乎漸有共識。此共識讓我們不致驚訝，邱貴芬對訪談下的結論是：認同的糾葛一向是台灣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就此來看，朱天心非常「台灣」（1998: 127）。且不論「眷村姊妹」是否受到召喚，單就結論來看，這確是不同認同立場者間，較具建設性的交流結果。而這個結果與觀點，也在邱後續的論述中，進一步深化。她表示：台灣的認同要繫於「允許不同的認同」，因好的社會本該允許不同認同並存，且台灣的認同正是透過承認差異而得以成立（邱貴芬 2006: 313）。由此意見看來，不同論者確有可能透過論述的交換與接納，拉近原本看似無法跨越的鴻溝。這無涉於對話者本人的認同改變與否，而是反映彼此間相互的基本尊重與承認。

2. 與左翼台灣認同有歷史因緣的楊翠

最後要討論的，是楊翠（2006）的研究。作為政治受難者後代，及與左派史觀有特定因緣的台灣文學、史學研究者，楊翠質疑朱天心的文

本，對台灣本土歷史記憶的重構，是一股保守反動的力量。⁵⁶ 她既對小說中呈現的歷史記憶與土地認同提出質疑；也企圖透過文本分析，證陳外省族群自我認同的搖擺。此一搖擺的認同圖像，及作品中的「政治」操演，則被楊翠用以作爲朱對台灣本土論述拒斥的證明。

與趙剛同樣視朱天心爲保守反動，也同樣對認同的政治操演持有一定敏感，並對認同的「工具效果」有所警覺。但相對於趙剛固守於「階級」論述，楊翠則直接將「族群」（身分）、「對抗本土論述」解釋爲朱天心保守反動的原因。由此解釋可推論，楊翠與趙慶華看法一致，認爲轉向台灣認同才是矯治保守反動的良方。

另外，此研究另一重要企圖，是反駁朱天心對政治受難者的「解構」，⁵⁷ 破解她對異議份子與台灣民主運動之理想性的「破解」，並反駁作家對台灣國族論述的「污名化」與對「他者」的貶抑。⁵⁸ 這一點，同樣與趙慶華（2004）分享了相同看法。差別則在於楊翠的文字中，蘊含了更多「當事人」的不平與澄清。

以楊翠（2006）對朱天心〈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的批判爲例。此小說描述有被迫害妄想傾向的老左派政治受難者，在出獄後發現親情失落與家庭關係之斷裂，及自身理想不被家人共感的荒謬。楊翠認爲朱

⁵⁶ 楊翠的祖父楊達，是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黨國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關於楊達、楊翠相處的點滴，可從楊達的〈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及楊翠的〈懷念阿公的農村曲——譜寫農民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5年11月18日），來略窺一二。

⁵⁷ 楊翠在註腳89提到朱天心這篇「解構」政治受難者小說，與楊達《綠島家書》篇章雷同度極高。可見除學術思辯外，楊翠本人實有不平之處必須抒發。

⁵⁸ 關於楊翠（2006）論文的重點，審查人之一認爲楊翠聚焦點並非朱天心如何寫自己，而是她如何貶抑他者。本文則認爲上述兩點同時出現在楊翠研究中。

天心透過文本進行所謂政治犯的解構，不僅誤寫「他族」歷史，也使受難者家屬呈現冷漠、無情、疏離的形象（楊翠 2006: 205）。不管此負面受難者形象，是否誠實反映作家的觀察，此種人物描寫，與楊翠身為政治受難者家屬所感知到的「我族」歷史，定有相當反差。因此，如同朱天心力抗的「眷村人=外省人=既得利益者」等式，楊翠也以學術論著來打破「政治受難者=天真愚昧=誤享盛名」的污名與關聯。雖說論文結論表示：朱天心小說背後的意義網絡費人猜想，是「眾說紛紜」得以介入的論述場域。而此論述場域，只反映了台灣社會無交集的辯論（楊翠 2006: 228）。儘管如此認為，楊翠仍在不預期溝通達成的情況下，選擇加入這場對話。這顯示，作為研究者兼「當事人」，當浸淫左翼文藝觀點的楊翠感受到她所參與的集體敘事，並未受到合理的尊重與承認，甚至被誤寫時，則文學研究不僅是關於作品的美學價值論定，更是意識形態攻防的實踐。而從事朱天心研究不僅是客觀知識生產，也是關於研究者如何透過「他族」，進而陳述「我族歷史」的認同論述建構。

七、結論：複雜的認同辯詰、形構，相互參照的「朱天心現象」

關於「朱天心現象」，不同於王德威的「文化工業」觀點，本研究認為：此現象最重要的內涵，是不同行動者以不同方式與程度，共同涉入台灣社會認同爭議之發展與變遷的過程與結果；而相異於楊翠所認定的「眾說紛紜、毫無交集」，此現象的意義則在於：這些不同論述並陳，恰好讓我們看見形構台灣當代認同的兩個主軸，亦即Hall（1990: 226）所謂強調的「相同／持續」與「差異／斷裂」。

朱天心所以成為被高度關注的參照點，有其個人和集體層次的因

素。就個人層次來說，涉及她本身主觀的行動選擇，及客觀的資本取得過程及社會關係形構。朱天心選擇對認同議題展現難以馴服的「戰士」形象與豐富的相關論著，使她在高度的認同爭議中，匯聚了辯論焦點。相較於其他「外省作家」，朱天心對熱點議題勇於表態、積極參與社會行動，並堅持「不認同的自由」，使她突出於他們之中，如同韋伯的方法論概念，成爲外省認同特殊的理念型與容易看見的「標的」。就客觀的資本取得過程與社會關係形構來說，朱天心的「外省作家」身分不僅是一種族裔的自然繼承，更是透過從文學世家、同好社團、外省第二代作家群等社會關係的運作，被形構出來。對研究者來說，透過朱天心這樣的理念型，既較易從事認同研究的比較、對比，也便於詮釋地瞭解或因果地說明。

就集體的層次來說，「朱天心現象」則和台灣當代認同辯論的歷史發展過程息息相關。朱天心三本與認同議題相關的重要著作，不管是問世前的醞釀，或者是出版後引發的討論，都與台灣重要的國族辯論環環相扣。朱本人對認同的關照以及論者對朱天心的評述，並非是一個真空的學術思辨，而是在整體社會發展過程中，隨著認同爭議，同步醞釀成形。張茂桂（2006: 43）曾提出「社會織成」的概念，認爲「社會織成」指涉了社會組成份子間假定一定存在的信賴關係、功能關係、共享的行事邏輯、網絡、制度，及與社會安全感、群體歸屬感有關但無法清楚計算或量化的，那些屬於「非實質」，難以直接覺察卻對日常生活有影響的問題。而朱天心與其作品這十幾年來不斷地被閱讀、爭論，以及這些論辯與當代認同爭議之重大事件的鉤合，也呈現了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與族群認同相關之行事邏輯、網絡建構、社會（不）安全感等等「非實質」面向的社會工程。

最後，透過對不同朱天心研究的考察，則可發現藉由研究朱天心，

研究者也表達了其認同立場，或標示了本人與其所屬群體在當代社會、歷史中的定位。種種「相同」或「差異」的演繹，顯露出「研究者」與「朱天心」的異同，也指涉了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身分認同，與朱天心本人及其所「代言」之族群認同間的異同。因此，各方人馬繞著朱天心作品「說話」，不是「文化工業說」所揭露的文化商品標準化操作，也不僅意味眾研究者的各自表述，更重要的是透過論述，定位或重新定位自我與他人。

綜合來說，「朱天心研究」作為一個「現象」，不僅反映了台灣社會關於認同議題的眾聲喧嘩，也呈現了認同辯論關鍵時刻，差異的銘刻與協商。並且，認同是一個互為主體的過程，人們不斷尋找自己與他人間的相似與差異，從而透過對「他者」的認識與界定，排開異己，尋找同類。如同Hall（1990）採取的立場，身分認同是一種永遠未完成的生產，只有當「我們信以為真的我們」及「別人認為我們的我們」和「我們逐漸變成的我們」不斷地對話、爭辯，那個混沌不清的自我，才可能往清明之境挪動小小一步。於是，一個作者的作品與它所透露出來的個人認同軌跡，之所以會被沸沸揚揚地討論、被賦予「代表性」來看待，正是因為加入論戰的各方，也想透過文字與論述的交手，解開別人，也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

對本研究而言，朱天心作為外省認同的理念型，作為一個易於參照的他者，其實就是一個因個人生命史與大歷史的交疊，而被自身言說與他人論述層層圍繞的顯著個案。如果透過對此論述複雜性的呈現，能讓參與論述者的處境更加清晰，並增進一些對「認同之所以然」的認識，則社會中某些人相見、相處而不相互理解的狀況，或能減少一些。

作者簡介

吳忻怡，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興趣爲文化社會學、藝術社會學、族群關係與認同。關心文化生產的社會過程，好奇身分認同的社會模塑。

附錄1 朱天心 / 朱家 / 台灣社會大事紀

時間	朱天心	朱家	台灣社會重要事件
1955		10月朱西甯、劉慕沙結婚，居陸軍官校旁「黃埔新村」	春天，蔣中正提倡「戰鬥文藝」
1956		8月24日老大朱天文出生	9月，夏濟安創《文學雜誌》為「戰鬥文藝」的對立面
1957		搬入「誠正新村」	10月，「戰士授田證」政策開始實施
1958	3.12出生高雄鳳山		
1959		朱西甯調職，暫遷苗栗銅鑼外祖父家	八七水災
1960	被寄養在苗栗外婆家	遷入桃園僑愛新村。5月，老三朱天衣出生	《現代文學》創刊，《自由中國》停刊，雷震被捕
1961		由桃園僑愛新村遷至板橋浮洲里婦聯一村	中國小姐選美開辦。5月，《文星》點燃中西文化論戰
1963	回到眷村與父母同住	朱天文入國小	
1964	9月入板橋中山國小		4月1日《台灣文藝》創刊
1965	轉入內湖國小、投稿《國語日報》	7月遷往內湖一村、朱西甯開始寫《八二三注》	國防部辦「國軍第一屆文藝大會」。11月，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12月《文星》停刊
1967	該年發現父親之張愛玲藏書，開始閱讀	朱西甯為巨人出版社編選「中國文學大系」	7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國民教育延長為九年
1968		朱天文成為第一屆國中生	1月1日《大學雜誌》創刊、《中國時報》創刊、九年國教開始
1969	進入內湖國中		「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
1970			1月15日「台獨聯盟」成立，總部設於紐約、11月「釣魚台事件」開始、12月「保釣運動」正式展開

1971		9月朱天文進入中山女高	台大校園出現「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的言論、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2	8月轉入和平國中	8月朱西甯自軍中退役，開始專事寫作、10月朱家自購景美住宅，結束眷村生活	2月28日關傑明發表「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現代詩論戰」
1973	9月進北一女，開始發表小說		5月高信疆任中時「人間副刊」編輯
1974	因朱西甯故，結識胡蘭成		
1975		朱家前往仁愛路參加蔣中正路祭	4月5日蔣中正逝世、8月《台灣政論》創刊，開始批評制度造成的省籍不平等現象
1976	7月，三三文友相約參加聯合報首屆小說徵文	5月，胡蘭成移居朱家隔壁，每週六晚上講「易經」	2月《夏潮》創刊
1976	9月「三三集團」成立、入台大歷史系、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佳作、11月9日三三辦第一次座談會，捲入鄉土文學討論		聯合報文學獎成立
1977	4月《三三集刊》創刊、7月成立「三三合唱團」、出版《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		2月《台灣文藝》革新第一號出版，鍾肇政主編、8月17日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登於聯副，鄉土文學論戰砲火點燃、8月20日余光中「狼來了」登於聯副，鄉土文學論戰開始、11月19日「中壢事件」

1978	10月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優等	2月4日朱西甯於聯副發表「鄉土文學的真與偽」、6月朱天文大學畢業	1月18日「國軍文藝大會」，王昇提「純正的鄉土文學」、4月鄉土文學論戰平息、5月中國時報文學獎開辦、12月16日中美斷交，中央民代選舉延期
1979	3月獲時報文學獎佳作、成立「三三書坊」、4月與朱天文赴日一個月，訪胡蘭成		8月14日「鹽分地帶文藝營」開始舉辦、8月15日「美麗島」雜誌創刊、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
1980		5月，昔日眷村要拆建為四樓國宅	2月28日林義雄宅血案、3月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
1981	大學畢業。〈未了〉獲聯合報小說獎	七月，胡蘭成去世	
1982	接「三三書坊」業務發行。出版《未了》	朱天文小說「小畢的故事」改編成電影	
1983	12月，完成「時移事往」		
1984	5月，「三三合唱團」解散、10月，與謝材俊結婚	8月「冬冬的假期」電影前往苗栗銅鑼外公家拍攝	1月，「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爭論出現
1985		朱天文寫侯孝賢電影「童年往事」劇本	11月《人間雜誌》創刊、12月龍應台出版《野火集》
1986	2月初為人母、11月四處參加民進黨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鹿港反杜邦遊行、7月27日蔣經國說出「我是台灣人」、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12月，增額立委、國代選舉
1987		2月朱西甯、朱天文香港探親	6月台灣正式解除戒嚴令、10月開放大陸探親
1988		4月朱家夫婦、朱天文大陸探親一個月	1月1日報禁全面解除、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民進黨通過「四一七」決議文，強調人民有主張台獨的權利、5月五二〇農民事件

1989	出版《我記得》	朱天文編劇「悲情城市」	六四事件、鄭南榕自焚、「無住屋團結組織」萬人夜宿忠孝東路、12月民進黨於縣市長選舉獲空前勝利
1990	5月簽署「反軍人干政」		2月國民黨「主流／非主流」政爭、三月學運、5月郝柏村組閣
1991	6月帶女兒陪父母至大陸探親	6月朱家夫婦大陸探親	5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清大學生「獨台案」、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0月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島嶼邊緣》創刊。
1992	5月出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2月參與社民黨，代表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		4月國策中心舉辦「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8月「外省人台灣獨立協會」成立、12月郝柏村被迫從行政院長去職、新國民黨連線在年底立委選舉中大勝
1993			3月14日新國民黨連線在高雄被反對者辱罵「中國豬滾回去」、5月20日李登輝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社區總體營造」展開、8月新黨成立
1994	2月出版《小說家的政治周記》	5月，朱西甯證實罹癌	李登輝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總統直選確立、12月台北市長選舉，趙少康提「中華民國保衛戰」、陳水扁勝選

1995		12月朱天衣代表新黨參與苗栗立委選舉	2月《中外文學》論戰展開、5月李登輝訪康乃爾大學、6月中共飛彈軍事演習、中華民國立法院第一次全面改選、12月14日施明德與新黨喝「大和解」咖啡
1996	開始寫〈古都〉		全民首次直選正副總統，李登輝當選、中共再次飛彈演習、6月《中外文學》論戰落幕
1997	五月出版《古都》、11月發表〈我不屬於台灣，要屬於哪裡？〉		5.18「用腳愛台灣」大遊行，訴求「總統認錯，撤換內閣」、6月3日李慶華開「認識台灣」教科書公聽會
1998		3月22日朱西甯去世	12月陳水扁連任市長失敗，馬英九當選
1999	7月發表蘇建和案感想〈但願在陽光下見面〉		5月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2000	11月出版《漫遊者》		3月陳水扁當選總統，民進黨首次執政
2001	5月26日參加「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研討會		2月小林善記《台灣論》出版引發爭議、7月李登輝主導成立「台灣團結聯盟」
2002		3月，朱西甯遺作《華太平家傳》出版	7月漢語\通用拼音爭議
2003	參加朱西甯逝世五週年研討會	3月22日朱西甯逝世五週年研討會	
2004	1月任「族群平等聯盟」發起人、4月22日發表〈我不愛台灣〉、5月參加「民盟」		民進黨舉辦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 3月20日陳水扁總統連任
2005	2月列名於「民盟」任務行國代推薦名單中		

參考書目

- 王德威，1996，〈從《狂人日記》到《荒人手記》——論朱天文，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頁7-23，收錄於《花憶前身》。台北：麥田出版社。
- 王德威，2001，〈頹敗的顫動：評朱天心《漫遊者》〉。頁67-70，收錄於《衆生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
- 王德威、黃錦樹編，2004，《原鄉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麥田出版社。
- 朱天心，1982，《未了》。台北：聯合報社。
- 朱天心，1994a，《小說家的政治週記》。台北：時報出版。
- 朱天心，1994b，〈會議現場討論記實（六）〉。頁389-390，收錄於楊澤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
- 朱天心，1997，《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
- 朱天心，2000，〈遠方的雷聲〉。頁132-150，收錄於朱天心著，《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
- 朱天心，2005a，〈作家的作家〉。頁003-012，收錄於黃錦樹著，《火與土》。台北：麥田出版。
- 朱天心，2005b，〈序：讀駱以軍小說有感〉。頁10-18，收錄於《降生十二星座》。台北：印刻出版社。
- 朱天心，2006，〈南都一望〉。《印刻文學生活誌》3(1): 46-63。
- 吳介民，2004，〈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頁299-355，收錄於李丁讚編著，《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吳忻怡，1996，《「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
台北：台大社會系碩士論文。
- 呂正惠，1992，〈怎樣的「後現代」？——評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光華雜誌》17: 7。
- 沈芳序，2004，《三三文學集團研究》。台中：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春蕤，1994，〈方舟之外——論朱天心的近期寫作〉。頁 335-344，收錄於楊澤主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
- 何寄澎，1992，〈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幼獅文藝》8: 67-110。
- 邱貴芬，1993，〈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22(3): 94-110。
- 邱貴芬，1998，《（不）同國女人聒噪：訪談當代台灣女作家》。台北：元尊文化。
- 邱貴芬，1999，〈「後殖民」的台灣演繹〉。論文發表於「十年來台灣文化研究的回顧」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科會、文化研究協會，民國88年9月18日至19日。
- 邱貴芬，2006，〈「身分與認同」講評〉。頁311-316，收錄於《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文學館出版。
- 林端，2005，〈導讀：伊里亞斯和他的莫札特〉。頁3-43，收錄於《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台北：聯經。
- 季季，2005，《寫給你的故事》。台北：印刻出版。
- 孫潔茹，2004，《游移／猶疑？——朱天文、朱天心及其作品中的認同與政治》。台南：成大歷史所碩士論文。

- 莊宣文，1998，〈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上）〉。《國文天地》13(8): 58-70。
- 陳昭瑛，1995，〈發現台灣真正的殖民史：敬答陳芳明先生〉。《中外文學》24(4): 77-93。
- 陳培文，2004，〈朱天心的生命風景與時代課題〉。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建忠，2001，〈荒謬的時代戲劇——談駱以軍的《月球姓氏》與族群文學書寫〉。「四方書網」書評20。http://www.4book.com.tw/Comment/CommentContentIndex.hi?SSN=1025
- 張大春，1990a，〈眷村子弟犯罪行爲的軍政淵源〉，收錄於《新新聞週刊》1990年12月31日。
- 張大春，1990b，〈眷村子弟江湖老〉。1990年12月29日，中時晚報時代版。
- 張大春，1992，〈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理的時間角力〉。頁5-17，收錄於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
- 張大春，1993，〈我妹妹〉。台北：聯合文學。
- 張茂桂，2006，〈族群和解的坎坷路〉。頁43-82，收錄於施正峰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張茂桂、吳忻怡，1997，〈教育對於統獨傾向的作用〉。《台灣政治學刊》2: 107-189。
- 張啓疆，1996，〈消失的□□：張啓疆的眷村小說〉。台北：九歌出版社。
- 張誦聖，2000，〈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頁349-367，收錄於梅家玲主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

- 焦桐，1998，《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出版社。
- 湯志傑，2006，〈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12: 141-190。
- 黃錦樹，1992，〈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從朱天心的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海峽評論》18: 85-88。
- 黃錦樹，2000，〈悼忌之書〉。頁6-25，收錄於朱天心著，《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
- 路況，1992，〈「黑盒子」邊緣的「白色雜音」——評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聯合文學》8(9): 187-190
- 齊邦媛、王德威編，2004，《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出版社。
- 詹宏志，1989，〈時移事不往：讀朱天心的新書《我記得》〉。收錄於朱天心著，《我記得》。台北：遠流出版社。
- 楊照，1994a，〈發現「中國」：台灣的七〇年代〉。頁127-134，收錄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出版。
- 楊照，1994b，〈「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139-146，收錄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出版。
- 楊照，1995a，〈浪漫滅絕的的轉折——評《我記得…》〉。頁150-159，收錄於《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
- 楊照，1995b，〈兩尾逡巡迴游的魚〉。頁160-170，收錄於《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
- 楊翠，2006，〈建構我族·解構他族——朱天心的記憶與認同之辯證〉。頁161-228，收錄於《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文學館出版。

- 曾意晶，1998，《族裔女作家文本中的空間經驗：以李昂、朱天心、利格拉樂·阿鳩、利玉芳爲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民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咸浩，1995，〈超越國族：爲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24(4): 61-76。
- 廖朝陽，1995，〈再談主體空白〉。《中外文學》23(12): 105-109。
- 趙剛，1994a，〈朱天心的前世今生——談朱天心的兩篇「眷村小說」裡的族群、性別與階級〉。頁138-149，收錄於《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與社運的批判》。台北：唐山出版社。
- 趙剛，1994b，〈眷村與我〉。頁150-151，收錄於《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與社運的批判》。台北：唐山出版社。
- 趙剛、侯念祖，1995，〈認同政治的羔羊：父權體制與論述下的眷村女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 125-163。
- 趙慶華，2004，《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鳩爲考察對象》。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淑華，1999，《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爲對象》。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紋豪，2003，《國族認同的失落與爭辯：朱天心小說研究1977-2000》。台北：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慕沙，2007，〈一盞燈火的熄滅——記老友舒暢〉。《文訊》258: 31-33。
- 羅久蓉等，2005，《姜允中女士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蕭阿勤，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台灣史研究》9(1): 181-238。台北：中

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5: 195-250。

蕭阿勤，2007，〈威權統治下的國族認同：隱蔽與公開、連續與斷裂〉。《思想》4: 141-175。台北：聯經出版。

Berger, Peter &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Bourdieu, Pierre,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ias, Norbert著、呂愛華譯，2005，〈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台北：聯經。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Pp. 222-237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it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